

ZHANG WENTIAN DE FEICHANG ZHILU

張聞天的
的



非常之路

程中原 / 著

人民出版社

ZHANG WENTIAN DE FEICHANG ZHILU

张闻天的

非常之路

程中原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萧 辉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闻天的非常之路/程中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

ISBN 7-01-003415-X

I. 张…

II. 程…

III. 张闻天-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017 号

张闻天的非常之路

ZHANG WENTIAN DE FEICHANG ZHI LU

程 中 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1 千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3415-X/K·688 定价:15.00 元

顾问：刘华清 李德生 黄 华

主 编：李力安

副主编：程中原 曹志为

困境中的偉人

薄一波





作者简介

程中原 1938年5月出生。江苏省锡山市人。汉族。中共党员。曾在无锡市当小学教员3年。195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59年至1976年在涟水师范、淮安师范等校任教导处副主任、进修部主任。1977年至1983年在淮阴师专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任党委委员、教务科长、学报主编。1983年评为副教授，为江苏省六届人大代表。1983年至1991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1986年评为研究员，1990年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至今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兼第二编研室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张闻天传》、《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伟人之初：张闻天》、《1976—1981年的中国》（合著）等，编辑出版张闻天著作、胡乔木著作和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多种。

目 录

一、 搏击“五四”浪潮	(1)
革命人生第一课	(1)
觉醒与思考	(2)
锋芒不减	(5)
奉行“三脱离”	(8)
二、 探求中的彷徨	(12)
陷入“无抵抗”的迷雾	(12)
一场短暂而认真的讨论	(13)
决心“做一个小卒”	(15)
三、 摆脱精神的“危机”	(18)
到大洋彼岸	(18)
孤独者的苦闷	(20)
从迷惘中走出	(22)
回国奋斗	(24)
四、 冲破旧势力的围攻	(26)
山城被谤	(26)
开辟新的阵地	(30)
“川师学潮”中的笔战	(33)
冷对军阀的迫害	(35)
“我要加入 CP!”	(37)

五、 在白色恐怖下	(40)
从赤都到白区	(40)
顾顺章叛变以后	(43)
向忠发叛变以后	(48)
突破“左”的樊篱	(52)
六、 在反“围剿”战争中	(58)
转移到江西	(58)
和博古的矛盾	(60)
受排挤后的分与合	(66)
再受排挤后的言与行	(69)
七、 受命于危难之际	(73)
不能往虎口里钻	(73)
生死攸关的转折	(78)
挑起历史的重担	(84)
跳出包围圈	(93)
脱离危险区	(95)
八、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103)
变内战为抗战	(103)
东征和西征	(110)
指导白区工作和白军工作	(115)
战胜分裂,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127)
逼蒋抗日	(133)
为了驱散内战阴云	(142)
九、 恪尽职守	(150)
跨入新阶段	(150)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153)

整风前后	(155)
创建合江根据地	(158)
探讨经济建设方针	(160)
在外交战线上	(161)
十、庐山蒙冤	(164)
忧虑与沉思	(164)
山雨欲来	(173)
讲真话:7月21日的发言	(180)
打成“反党集团”	(184)
十一、罢官后的求索	(195)
下庐山	(195)
“我不能闲着”	(197)
科学的共鸣	(200)
十二、戴着“帽子”搞调查	(204)
调查的契机:七千人大会	(204)
处境特殊的调查	(206)
发展集市贸易的报告	(210)
十三、疾风劲草	(213)
风暴袭来	(213)
219起“接待”	(218)
“六十一人案”	(219)
523天“监护”	(223)
十四、“遣送”肇庆	(227)
限令三天离京	(227)
幽居牛岗	(228)
肇庆文稿	(232)

缓慢的改变	(233)
十五、最后的脚印	(237)
到无锡落户	(237)
重病中的惦念	(240)
在黎明前死去	(244)
历史最公正	(247)

一、搏击“五四”浪潮

革命人生第一课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对于张闻天来说,五四运动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一课。张闻天当年19岁,是设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张闻天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成为南京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生之一。他不仅斗争坚定、勇敢,而且表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和写作才华。

南京学生在得知5月4日“北京学生激于义愤,集众示威焚巢殴贼”,而几十名学生“横被羈禁”的消息后,立即同声相应,并行动起来,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5月9日上午8时,张闻天参加了南京6000多学生在城东小营操场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会后游行,沿街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取消密约”等口号。5月中旬,南京市内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街头白旗飞扬,传单若雪。“河海”学生开设“国货贩卖部”作为呼应。进入5月下旬,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讲演团十分活跃,不仅在城区间演讲宣传,还赴市郊集镇、村庄讲演。对于学生运动,南京当局采取软硬两手,在虚言应付的同时,武装军警曾多次用武力驱散游行队伍和讲演现场,造成群众受伤。张闻天不擅鼓动而长于写作,这时的一些讲演稿

(流传下来的有《中华民国平民注意》),就出自他的手笔。

随着运动的发展,5月26日上海学生25000多人“宣誓罢学”。南京“河海”等校立即响应,28日南京全市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罢课。6月2日全市学生再度集会小营操场,举行宣誓典礼,齐诵誓词:“拥护国权,发扬民意,协力同心,死生以之。”6月3日北京当局大量拘捕爱国学生,全国民气激扬,工人运动掀起,形成“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反日爱国浪潮。到6月7日南京实现“三罢”,沪宁线火车和长江轮船全部停驶。由于南京警方殴打、拘捕学生,又激起6月8日南京1万多学生、工人与市民的抗暴示威游行。至6月10日北京被捕学生获释归校,曹、章、陆也被宣布罢免,南京的“三罢”斗争才基本结束。

在“五四”到“六三”这一个多月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中,张闻天不怕当局的武力威压,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得到了锻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成长为思想激进、引人注目的青年。当时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就是在5月底南下发展学生运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时同张闻天结识的。他在60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说,“那时张闻天年纪很轻,大约是十七八岁,很活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张闻天在许德珩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说明他在五四运动中确实是南京学生中的突出人物。

觉醒与思考

张闻天在五四运动高潮中的突出表现,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时代风云的刺激和在“河海”期间的学习,唤起了张闻天“自我”的觉醒和爱国的情。

张闻天生长在一个忧患与希望交织、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年代。

1917年张闻天考入“河海”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收场，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护法战争正在湖南激烈进行……“河海”的同学家境大多不怎么富裕，很少“纨绔子弟”，不少人同张闻天一样，关心着天下的兴亡。图书馆阅报室里的《新青年》、《申报》、《时报》、《救国日报》等报刊，是他们天天接触的读物。国内外时局的发展，都会在他们心中激起波澜。张闻天和同班同学海门人刘英士（善乡）、奉贤人顾宗杰非常要好，同高一级的沈德济（泽民）更结为至交。他们常常在课余饭后，聚在走廊上、宿舍里讥评时政，议论怎样改造中国的问题。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校。办学条件虽然很困难，但校风很好，教学水平也堪称一流，学校以培养治理淮河、海河的专门人材为目标，把养成“高尚之人格”、“勤勉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作为办学的方针，形成了一种俭朴、务实的校风。学校的实验室在当时属于上乘。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可以几人一组进行实验，各种测量仪器也足够学习之需。英文水准很高，所用教材都系美国出版，课堂讲授也用英语，另外还有两年英文课程，选读名人名篇和工程演讲录。张闻天能够较早从英文接触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说得益于此。

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形成的时期。张闻天进入“河海”以后，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接触了欧美的政治、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熏陶和科学精神的冶炼。特别是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激进起来。他的“自我”意识被唤醒，独立人格被发现，反对封建束缚、宣扬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

可是,现实人生却依然顽固地按照老中国的传统轨道运行。觉醒了青年张闻天沉浸在忧国忧民的思虑之中,满怀着亲子之爱的张闻天的父母却在费心尽力地为他构筑小家庭了。亲事已经替他订好,女方是邻村行前桥的卫月莲。1918年初,张闻天放寒假回到家里,父母就把完婚的事提到他的面前。这对于张闻天说来真是太突然了。张闻天觉得,这种婚姻是父母设置的牢笼。这样包办,是剥夺他恋爱的自由权,是蔑视他个人的人格,是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新思想同旧传统激烈冲突,儿子同母亲大吵了一场。母亲反复对闻天讲,这样做完全是“为你好”;闻天再三对母亲解释,这样做完全是“害了我”。争到最后,儿子决绝地说:“你要娶媳妇的话,就不要我这个儿子;你要我这个儿子的话,就不要娶媳妇。”母亲伤心地抹着眼泪,执拗地回答:“我两个都要!你是我养大的,你忍心不要我,不要你的娘吗?”

在这一场新旧冲突中,母亲最终得胜。张闻天“家庭革命”的第一个回合没有成功。他只得勉强收下母亲给予的这个“赠品”,而卫月莲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成了“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姻悲剧给张闻天极大的刺激,他深深感到个人力量的弱小,即使是亲子的温情也无法融化封建传统的冰块。他也为自己不能斩断母子之间情感的牵制而懊恼,痛切地感到,不反抗旧道德、旧习惯,个人从灵魂到肉体也就没有自由可言。张闻天在婚姻问题上的痛苦的、愤激的感情体验,激发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张闻天一往无前地投身于“五四”浪潮,刚刚发生的这桩封建婚姻的压迫不能不说是一个直接的动因。

1918年春张闻天回到学校,《新青年》上许多宣扬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篇章立即引起他的共鸣。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指出,新旧不调和的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

突”。这种况味张闻天刚刚切身体验过，所以对李大钊召唤“新青年打起精神”、“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心向往之。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也在《新青年》上登载出来了。小说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后面“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小说提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诘问，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振聋发聩，动人心魄。接着，《新青年》又推出“易卜生号”，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等剧本的译载，对易卜生主义的介绍，使得刚刚身受封建婚姻痛苦的张闻天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弊端。这时，他对旧社会已经从怀疑、不满进而否定、反抗了，他的兴趣也从工程技术转向社会问题。

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对苏俄的报道逐渐增多，《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也不断发表评介、歌颂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Bolshevism 的胜利》……张闻天从报刊上，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文章中，看到了这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不仅把目光注视着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掀起的社会主义浪潮，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思想的问题已经不仅限于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而是怎样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了。

张闻天是带着这样的生活和思想基础迎接五四运动的。他在运动中表现得积极、坚定，能够不怕威压站到运动的前列，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锋芒不减

6月10日以后，轰轰烈烈的局面逐渐过去。当局为了阻遏和

防止学潮再起,采用釜底抽薪的计策,宣布学校提前4个星期放假,让学生各自回家,妄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制止学生运动。张闻天、沈泽民等革命青年看穿了当局的用心,没有离开学校,继续留在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石头城,与本地各校同学一起,做坚韧不拔的斗争。

1919年6月23日,一份8开4版的铅印日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出版了。它比五四时期著名的同类刊物《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都要早20多天。《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宗旨是“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围绕着“改良社会”这个中心,及时报道了南京本市、江苏各地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情况,猛烈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展开了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惯的批判,有力地宣传了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是这份日刊的编辑科科员,该刊的重要撰稿人,是发表评论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

张闻天写了不少随感录和杂评,这些针对现实生活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写得尖锐泼辣,言简意赅。他的政论,更表现了他进行启蒙宣传的热情,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他在《中华民国平民注意》一文中召唤中国几万万平民觉醒起来,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局部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实利的而非空文的”国民,“想别的法子,去做牺牲也不要怕”,以“扫除以前种种痛苦”。

关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究竟采取激烈的还是温和的办法,是当时正在辩论的问题。特别在拒绝签约和罢免曹、章、陆以后所谓“薄海同庆”的背景下,否定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方式的思潮被很多人所接受。当时有一份刊物就在创刊《宣言》中“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

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张闻天当时才19岁,在纷繁复杂的思潮面前,能够认识到,要改造黑暗的中国,温和方式是无用的,应该抱定“做牺牲也不怕”的决心,去废除封建军阀的统治。这在参加五四运动的最先进的青年学生中间也是不多见的。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张闻天还在这个日刊上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题为《社会问题》的文章中,张闻天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来“进窥”即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指出,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变专制为共和的进步局面,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专制时代。在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现在最紧要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也就是推翻封建统治阶级。至于应该怎样革命,靠谁来革命,张闻天的回答是:“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张闻天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认识到发动新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是工人和农民,这是难能可贵的。

青年张闻天还以开阔的视野指出革命要分两步走:“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这一步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他相当具体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并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宣传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1919年9月问世的。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是在1920年5月。张闻天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和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发表在1919年8月,可见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